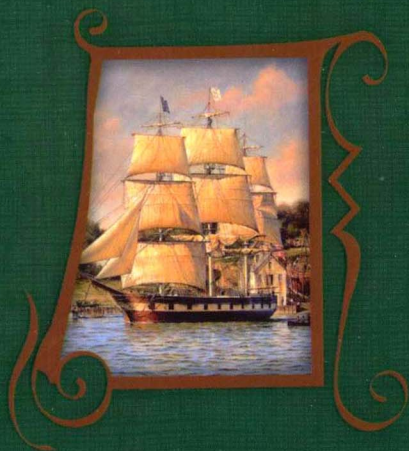




东亚区域合作分析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变迁

吴湘宁 著



Analysis of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China's ICT Industry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东亚区域合作分析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变迁

吴湘宁 著

Analysis of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China's ICT Industry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www.lib.pku.edu.c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区域合作分析: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变迁/吴湘宁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01-21961-4

I. ①东… II. ①吴… III. ①信息产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国
②信息产业-产业链-研究-东亚 IV. ①F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1743号

书 名: 东亚区域合作分析——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与东亚
区域生产网络变迁

著作责任者: 吴湘宁 著

责任编辑: 武岳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961-4/F·34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4.75印张 218千字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词语缩写

ADB	亚洲开发银行
APT	亚太电信联盟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VS	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
CAR	比较优势再循环
EARPNs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TNS	固定电信网络服务
GAID	全球电子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联盟
GATT	关贸总协定
GII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
GOTA	全球开放式集群架构
ICT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PNs	国际生产网络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
ITU	国际电信联盟
METI	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
MNCs	跨国公司
NII	美国国际信息技术架构
RPNs	区域生产网络
Super VCP	超级视频压缩处理器
TD-SCDMA	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技术
WAPI	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
WTO	世界贸易组织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 1

第一章 区域生产网络(RPNs) / 8

- 一、不同的方法路径 / 9
- 二、理解跨国网络 / 13
- 三、跨国研究的路径整合 / 18
- 四、理论应用 / 33
- 五、研究方法 / 45
- 六、小结 / 48

第二章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与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 50

- 一、生产网络 / 50
- 二、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 61
- 三、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与中国 / 63
- 四、小结 / 71

第三章 中国政府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 72

- 一、政府的角色——国内角色 / 74
- 二、国家的角色——地区和国际层面 / 99
- 三、小结 / 123

第四章 中国企业 / 124

一、跨国公司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125

二、理解中国本土信息通信技术企业的作用 / 137

三、中国本土信息通信技术企业——按行业部门 / 146

四、小结 / 165

结 论 / 168

附 录 / 179

附录 1 / 179

附录 2 / 181

参考文献 / 183

导 言*

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顺序性、次第性追赶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首先成功地实现经济现代化并在此之后对产业结构进行持续不断的完善,完成产业升级。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第一个发达国家。日本的部分产业以及产业的部分领域在此期间逐步发展成熟并完善,遂逐渐将这些领域的生产转移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样的邻国和地区。东盟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成为日本产业转移的下一主要目标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继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产业转移目标国。这种多层次的结构以及“次第追赶”发展的模式被称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Akamatsu 1962; Kojima 1960, 1978, 2000)。这种模式在战后极大地推动着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成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整合的助推器,并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而日本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领头雁。

当然,学界对于雁行模式本身从多个角度进行了不同的批判,而中国的崛起本身也对雁行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人震惊。这种震惊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在此过程中ICT产业的飞速发展(Kumagai 2008: 1)。在熊谷看来,日本原有的领头雁地位现在已经被急速上升的中国所替代。这意味着传统的次第追赶发展的模式已经过时,而这种模式本身倾向于追

* 本书根据作者2009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系博士毕业论文整理修改完成。

寻发展高技术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Kumagai 2008)。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东亚层次分明的、次第追赶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告终结。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毋庸置疑地证明着它的崛起,这种崛起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力量上的日渐强大(Roy 1994; Shambaugh 1999; Deng 2001),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人权问题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可持续发展从反面也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验证(McCarthy 2005; Foot 2000)。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无可争辩的经济成就,以及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秩序所带来的影响,人们也乐于将中国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世界经济中衰退的日本进行对比(Naughton and Lardy 1996; Beeson 2007; Yusuf 2008)。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些研究成果的主要论调就是“中国威胁论”(Kynge 2006: 11)。这些声音在进入21世纪后渐弱,但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这一客观事实始终是学界、政界讨论的焦点议题。

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缓慢进展,比如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从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升级。作为一个此前一直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低端产品并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来说,中国被视为邻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主要竞争者。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变得日渐重要起来。尽管不断增长的中国进口需求(在2003年增长率达到40%,2004年的增长率是37%)已经被视为东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Gaulier and Lemoine et al. 2005)。但是,考虑到东亚诸国相似的出口结构,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恶性竞争。其他东亚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包括恶化的就业率以及逐渐减少的投资。根据日经新闻在200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49.1%的日本生产商选择将他们的海外工厂转移至中国(人民网2001)。其结果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由于长期依赖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位于产业链的末端,部分国家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停滞不前的趋势(Perlez 2002; Shenkar 2004; Holst and Weiss 2004)。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力量转移的研究(Shenkar 2004; Breslin 2005; Fishman 2005; Gu 2005; Preeg 2005; Kynge 2006)。

有一种说法是,来自于中国的竞争是东亚各经济体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朱文晖2001)。东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而近年来中国自身的产业化进程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在

很大程度上又反作用于这些东亚国家(Watanabe 2003; Wong 2006: 31)。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城市。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生产网络发展过程中日渐扮演重要角色,进而对整个国际和地区的生产网络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有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威胁论”有不同的看法。西格尔就认为,综合评价中国的国内问题、经济实力、军事以及政治实力,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大国、一个对亚洲和世界无甚影响的大国(Segal 1999)。西格尔研究的本来目的在于,通过强调一个在世界另一端崛起的中国的重要性,说服当政者制定理性的对华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希望将中国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对待。西格尔的结论需要结合中国随后的发展来分析。如同哈瑞斯在之后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国家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同时该区域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各个国家的发展轨道也与中国的一举一动密切相关(Harris 2003)。这些研究对于试图理解中国在东亚以及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来说极为重要。在这些纷繁变化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尤为重要,也就是本书将要做重点评述的 ICT 产业的变迁(Friedman 2006)。

根据 2003 年经合组织的报告,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和欧盟成为最大的 ICT 产业产品的出口国,出口额在 2006 年的时候达到了 1800 亿美元(OECD 2006)。中国在 2006 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产品出口国以及第六大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购买国(*The Economist* 2006)。此外,中国已经开始参与 ICT 产业相关产品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其中有一些已经由国际电信联盟(ITU)授权同意。考虑到 ICT 产业在中国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东亚的三角贸易模式,研究和分析中国 ICT 产业的发展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 ICT 产业出口的增加导致了其他东亚国家 ICT 产品出口量的下降。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优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中国 ICT 领域产品出口量的上升(Amighini 2005: 213)。到目前为止,中国 ICT 产品的贸易额不仅持续提升,同时成功地实现从进口产品组装到大规模生产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中间产品的产业升级(Amighini 2005: 204)。此外,如前所述,中国已经逐步开始在国际信息通信标准制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独立的 3G 标准,也即“时分同步

码分多址”(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SCDMA)。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特别报告指出,中国是决定亚洲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ADB 2006)。如同布雷斯林所述,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从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大规模生产升级到高附加值产业端,就应该重新思考对中国的定位(Breslin 2005: 751)。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中国在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很难被忽略(Harris 2003)。现在的问题在于,该如何评估这样一个客观存在。

为了更好地理解 ICT 产业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深入了解全球化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以及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层面上是如何构成的。本书主要的关注点之一在于全球化日渐被全球产业生产链的发展所主导(Yun 2003)。全球产业生产链是指全球产业生产链中的所有活动都可以被数字化、细化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转移。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大量从东亚国家进口 ICT 产品,同时推动这一地区逐步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全球 ICT 产业的生产、出口平台,并且该地区目前正逐步实现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 ICT 产业升级的转型(Kim 1997)。实际上,全球产业生产链的发展进程本身也促进了东亚区域范围内的资源分配。根据研究,区域生产网络在 ICT 产业领域的进步已经在事实上推动着中国 ICT 产业的发展以及之后该产业的升级、转型。本书力图研究中国 ICT 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区域生产网络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崛起是否取代了日本在该地区的重要角色?中国的重要地位是否是以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代价的?中国将会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此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是如何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的?本书试图以中国为重心,通过对于区域生产网络的变化来分析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无形”这一特征的影响。简言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 ICT 产业的发展到底给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更准确地说,本书试图解释中国 ICT 产业的发展变化是否重新构建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模式,而这种模式长时间以来是以日本为中心的(葛顺奇、李泓 2005)。

本书将以中国政府在 ICT 产业领域的政策变迁以及机构改革的发展历程为起点。事实上,本书将检验中国政府为推动 ICT 产业的发展在国内以及地区层面上所做出的努力。为准确分析中国政府在政策法规制定层面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书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

来理解中国政府角色的变化是如何发生以及是否真正地对某一领域产生了影响。因此,本书回顾了所有重要的与 ICT 产业发展相关的机构改革以及国家层面的工业计划。历史研究方法同样也被运用于研究中国政府在地区层面上的影响。如同本书将要阐述的,中国政府不仅通过相关的部门在国内政府层面加强和推动 ICT 产业的发展,同样也通过外交途径在外交层面付诸努力,以此试图营造一种理想的、有利于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的国内和周边环境。通过对重要的政府白皮书、年鉴、官方文件和网站,以及个人访谈的细致研究,本书尝试着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政府正在以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构建中国 ICT 产业发展的区域战略。本书并不简单地假定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重大的区域影响一定直接促使中国成为地区领导者。相反,基于研究成果,本书清晰地表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有历史渊源,不能够简单地脱离对方以及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去理解。

为了展示中国 ICT 产业的变化,本书详尽描绘了中国企业是如何从一个世界生产基地、模仿大国、产业追随者,成长为一个逐渐走出国门的成熟跨国企业的。本书集中论述了因 ICT 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贸易以及投资上的变化。与此同时,本书对外国投资和东亚区域内基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以及联合开发所建立的合资公司都有深入的分析。此外,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大背景下的三个大领域中的五个公司发展案例将被用来深入分析。前两个案例是来自于中国 ICT 产业中的信息通信设备制造部门;接下来的两个案例与 ICT 领域中的软件业有关;最后一个案例是关于中国通信行业的。这些案例研究反映出中国 ICT 产业中低端和终端产品的生产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政府和企业是如何努力成长为 ICT 产业中更为重要的角色的;而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世界工厂的发展特色。这五个案例实际是从该产业的不同层面展示中国 ICT 企业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于案例的集中分析以及对产业发展进程中地区以及国内的种种问题的关注,本书旨在通过关注 ICT 产业的发展,分析中国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的变化。而这一特定部门的发展被人们认为是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实力的。作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石,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深刻地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动力、发展轨迹以及基础。通过对于区域生产网络发展的关注,本书指出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完全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发动机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无论是对于 ICT 产业以及整个地区的发展,我们只能说中国的影响力难以忽视,并对整个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意义深远。总之,本书主要希望能够从区域生产网络发展和其重要性的角度来论述一个变化的中国和发展的东亚之间的关系。

如同在第一章会清楚阐述的,对雁行模式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Nester 1992; Rowthorn 1996; Kregel 1997; Kasahara 2004)。暂且不论与雁行模式有关的争论,雁行模式所主张的通过地区层级结构追赶发展的经济模式以及基于产业和地区层级结构的区域劳动分工,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价值。本书在结论中指出,对于 ICT 领域而言,雁行模式依然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的本质,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国际生产产业链的发展特征这一要素。通过集中论述 ICT 这一对整个地区和国际分工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的产业,以及通过深入分析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地区层面上的表现,本书在错综复杂的产业链中对中国和东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论述相关变化的同时,本书对雁行模式本身的重要性以及适用性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和修正。分析明确指出,这一理论至今依然在很多问题上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比如从追赶发展进程中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的关系,另外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资本流向。通过对于逐步升级战略的关注,以及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大跨步式的发展,本书主要运用雁行模式深入解释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 ICT 产业的发展到底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产生何种影响。以 ICT 产业为重心,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加以论述。同时,实证研究也展示了整个进程的不同层面,而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雁行模式的价值和其适用性。第二,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对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

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通过区域生产网络架构的过程和方法为全书以及后续研究提供论述的分析框架。这一章通过改进的雁行模式、“温特主义”和国际生产网络概念的引入,为如何理解区域生产网络提供了思考语境。第二章回顾了整个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

进程,尤其是 ICT 产业发展。本章上溯到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这一阶段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逐渐形成的时期,同时也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特别是,本章展示了中国 ICT 产业是如何迅猛发展的。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中国政府在推动 ICT 产业发展进程中在国内和地区层面所扮演的积极和重要角色。如同在第三章将要论述的,基于技术实力基础上的技术层级对于决定一个国家在地区层面上的实力排名意义重大。这是因为技术实力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在事实上依然受到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掣肘。第四章详尽论述了中国本土 ICT 公司的发展路径,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日渐削弱的事实。第四章也深入分析了整个中国本土 ICT 公司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性。结论部分认为,分析中国 ICT 产业实际上为理解中国和东亚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客观、重要的窗口和解释途径。

第一章 区域生产网络(RPNs)

本章将为全书提供理论分析框架,据此来理解如何运用某种特定的“区域生产网络”(RPNs)研究方法以及这种方法为何能获得突出地位。具体来讲,本章旨在为本书所关切的所有核心议题奠定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在理解“区域生产网络”的问题上,为什么雁行模式具有支配性的地位;雁行模式遭遇挑战的原因何在;以及修正后的雁行模式是否能经得起批判并继续运用于区域生产网络的理解中。

本章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将概览“雁行模式”如何对“区域生产网络”进行概念化和建构。这为接下来关于东亚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理论基础(见第二章)。第二部分试图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理解区域生产网络。第三部分回顾国际生产网络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挑战传统的理解区域生产网络的方式。第三部分试图探求如何将国际生产网络的变化整合进“雁行模式”,并提供一种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基本框架。第四部分重点关注雁行模式中用来理解区域生产网络的关键要素——这里专指东亚区域。本章意在证明,虽然雁行模式受到持续的挑战,为何它依然可以被用来理解区域生产网络。本章建立了理解区域生产网络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上述这些都会有助于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目前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EARPNs)以及一国的特定变化将如何在根本上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

一、不同的方法路径

理解区域生产网络路径方法有很多。其中,雁行模式是早期研究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方法之一。

1. 传统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来的,基于其观察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棉纺织业发展所获得的经验创立了此理论。如下是赤松先生对“雁行模式”基本形态的解释:

野雁排成“倒V形”的队列飞行,就如同飞机编队一样。野雁的这种飞行形态对应如下描绘的三条时间序列曲线,也即欠发达国家的“进口”、“国内生产”以及“制成品出口”。(Akamatsu 1962: 9)

由于坚信工业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同时假定生产成本和自然资源差异的存在,赤松先生清楚地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可以通过持续的“追赶”过程被欠发达国家所复制(Ray, Ida et al. 2004: 465)。在这个追赶的过程中,先进技术可以更容易地通过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获取;相应地,还需要更强大、更有效率的政府层面的国家支持——也即以国内政策、法规的形式出现,也包括相关的对外政策。

通过深入分析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贸易与生产活动,雁行模式强调:在给定的某个生产过程中,“要素禀赋”^①的变化会导致包括一国国民经济中技术在内的比较优势转移。外国直接投资、技术与贸易是雁行模式的三个主要机制。这三个主要机制使追赶进程和比较优势循环过程能顺利地进行下去。赤松先生相信,贸易是向一国国内引进新产品和技术的主要途径(Akamatsu 1962)。进口在

^① 要素禀赋指生产活动中的相同要素。根据李嘉图的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一切交易都基于简单的李嘉图比较(技术)优势。国际贸易之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Roy 1990)。

一定程度上使本地消费者受益,并有助于转移和获取可用来生产进口替代产品的技术和资本。同时,在一开始,进口也会淘汰“追赶经济体”中的很多本地公司,并让许多本土制造业部门濒临破产境地。

整个“追赶”过程涵盖四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消费制成品并出口初级产品。第二阶段,发展中国家具备在国内生产此前的进口的产品的能力之后,开始在削减购买消费制成品的同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第三阶段可以被当做一个出口导向阶段,即发展中国家能一边开始出口消费制成品,一边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第四阶段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已成为成熟的出口者。它们掌握了所有那些曾由发达国家拥有并掌控的、关于消费制成品的技术与工艺。因此,就像发达国家曾在第一阶段经历的那样,这些发展中国家逐渐将消费制成品的生产转移到尾随其后的后进国家。与此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出售资本密集型产品。在赤松先生看来,凭借这四个阶段,一个既定地区的国家将会拥有类似的产业结构与发展路径(Akamatsu 1962)。

这四阶段体现了“追赶模式”的精髓。赤松先生进一步对此进行阐释,这样的模式不仅在一个给定的产业中存在——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逐渐升级到复杂、精密的产品生产;同时也存在于宏观的民族产业中,也即逐渐从诸如纺织品的消费制成品过渡到电脑和高科技产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Akamatsu 1961: 208)。通过产业内部的四阶段演化——产业合理化,以及跨产业四阶段过渡——生产多元化,某个产业能提高其效率并增强竞争力。同时,某个特定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能最终通过生产多元化得到升级。

雁行模式假定层级结构的存在,并强调层级结构的重要性。也即,以一个主导性经济体为增长中心,在其后追随着其他发展中经济体(Kasahara 2004: 8)。简单说,赤松的理论就是指欠发达国家通过走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来实现自身经济的进步。赤松先生假定所有相关国家都因为经济互动而紧密联系起来,并试图不断向上攀登“发展阶梯”。这样一来,一个层级结构就形成了。据雁行模式的假设,在该层级结构中,国家分成两个次群体。第一组包括先发的领先国家;第二组包括那些追随在第一组国家之后的“追赶”国家。然而,领先国家和追赶国家的位置并不固定(Korhonen 1994: 95)。一旦领先国落后,一些具有实力的追赶国就会超越到前列。总而言之,雁行

模式预先假定在领先国和追赶国之间存在着经济关系的动态变迁(Hiley 1999)。

再者,依赤松先生之见,在此过程中,国家扮演关键角色。雁行模式中连续相继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国家的支持与推动下,新产业或部门日渐强大(Ozawa 2001: 472)。在雁行模式的四阶段中,各国政府需要为技术转移、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广泛地限制进口提供优越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环境,以便能有意识地建立和增强相关的国家支柱产业。

总之,雁行模式的核心思想包括两点。其一,在产业中和产业间、在一国之内和国家间存在着一个持续的追赶过程。其二,在一国之内和国家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的比较优势循环过程。赤松雁行模式的要义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进程中的渐序追赶模型。正如赤松先生曾总结过的:

工业发展的“野雁飞行模式”指的是欠发达国家经济体在与发达国家建立国际经济关系之后的发展。(Akamatsu 1962: 11)

在赤松先生于日本提出雁行模式的同时,雷蒙·弗农(Raymond Vernon)在观察了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类似循环现象后提出了生产周期理论。雁行模式理论和生产周期理论之间确实存在共性。像卡明斯等一些学者曾将它们互换使用过(Cumings 1984; Tan 2001)。然而这两种理论路径只是在类似现象中得出了相似结论,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观察。

2. 生产周期理论

弗农于1966年首次提出生产周期理论,后在1971年对其进行了改进。它是关于在国际贸易中一种新产品的周期性变化的理论。通过关注构成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战略经营活动的贸易与生产活动,弗农指出:比较优势的转移是由于生产过程发生了变化,并源自特定的要素禀赋——包括每个经济体的技术(Kasahara 2004: 11)。

弗农相信,任何制成品都会经历四个阶段:新产品初始阶段;产品成熟阶段;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的市场衰退阶段(Vernon 1966: